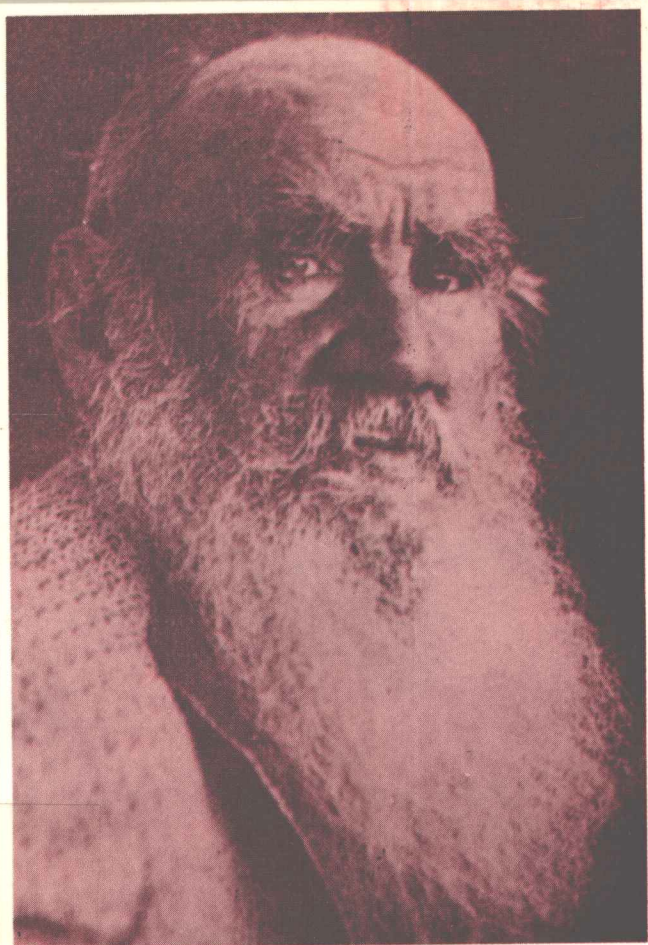


西方思想家譯叢⑩

托爾斯泰

作者：Henry Gifford

譯者：王美音



西方思想家譯叢⑩

托爾斯泰
Tolstoy

Henry Gifford 著 王美音 譯

托爾斯泰 西方思想家譯叢⑩

72.5.0618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第二次印行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著者 Henry Gifford
譯者 王 美 晉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7號
電話：7681234 — 2317
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 11012-10 •

托爾斯泰

亨利·吉佛 (Gifford, Henry) 撰 王美音譯

民國72年 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3]119面 21公分

原書名：Tolstoy

附：徵引書目、書目小註、人名註釋及索引
民國73年第二次印行

I. 亨利·吉佛撰 II. 王美音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784.88

8535

847

73

NT\$ 100.00

封面設計：文庭澍

西方思想家譯叢

荷馬

柏拉圖

耶穌

馬基維利

蒙田

伽利略

休謨

柏克

柯立芝

托爾斯泰

序

在這套叢書中，一本討論托爾斯泰的書自然會涉及他的思想。托爾斯泰晚年，以思想家、宗教領導人和現代文明的批判者著稱。但他主要的還是一個藝術家，是他的小說和故事為他的觀念贏得了讀者。本書中有兩章分別討論托爾斯泰主要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尼娜〕。其他的小說作品將在討論他生活和思想的幾章中加以討論。托爾斯泰對教育、宗教、個人行為和社會行動，以及藝術的觀點都相當重要，都值得分章討論。一開始我將簡單敘述他和自己的時代及國家的關係，以及他在建立事業時所面臨的困難。最後，我試圖重估托爾斯泰在我們這個時代所代表的意義。

有關托爾斯泰的評論不可勝數，其中有不少傑出的作品。許多前人的作品對我都有很大的幫助，雖然在書目小註中我只列了一小部分。所有熟悉這個題材的人都會發現，艾克恆勃（Boris Eykhenbaum）權威性的研究以及與托爾斯泰同時的批評家——托爾斯泰英文傳記的作者，莫德（Aylmer Maude）對我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要感謝維琴尼亞·李維玲·史密斯 (Virginia Llewellyn Smith) 對本書頗有助益的批評，並要感謝瑪格麗特·米爾森 (Margaret Milsom) 爲原稿打字。

亨利·吉佛 (Henry Gifford)

一九八一年三月布里斯托

目錄

序	I
第一章 托爾斯泰的立場	1
第二章 文學事業的探索	9
第三章 鄉學中的課業	19
第四章 「戰爭與和平」的完成	27
第五章 步入危機：「安娜·卡列尼娜」	41
第六章 托爾斯泰與宗教	53
第七章 我們應當做些什麼？	63
第八章 藝術的意義	73
第九章 離家	83
第十章 重估托爾斯泰	89
徵引書目	99
書目小註	101
人名註釋及索引	103

第一章 托爾泰斯的立場

列夫·尼古拉也維奇·托爾泰斯常因不知如何界定自己的立場而極度焦慮不安，他畢生致力於尋求和解釋這個問題。以「托爾泰斯的問題就是他自己本身」這句話來評論他，絕非輕率之言。他的追尋蘊藏在自我心中，直到最後一刻，他仍企圖使自己的立場無懈可擊，與其說是避免他人的批評，無寧說是爲了使自己的良心毫無疑慮。

托爾泰斯於一八五一年離家，和他從軍的兄弟尼可萊一同往高加索去，不久他加入軍隊，成爲後補軍官。他離家時是一個不滿和不安的年輕貴族，但他的精神之旅一直持續到六十年後他離家時方告結束。這漫長而艱辛的精神之旅，充滿了挫折和疑慮，支持著他的是一個單一的目標。跟著托爾泰斯，我們似乎走過了最令俄國困擾不安的年代，走過了激烈的革命和永遠無法逆轉的改變。托爾泰斯這個偉大的叛徒，總是能够跟著直覺的引領去面對一些當時的問題。除非我們知道他的思想對當時俄國的意義，我們才能完全了解他的思想。對西方的讀者而言，托爾泰斯可以說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俄國作家，他可以說得上是歌德（J. W. von Goethe）所預言的世界文學裏的一員大將。〔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在情感上是極其俄國的，但是我們並不覺得陌生。〔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也和其他偉大的英

國小說一般接近我們——和美國小說，如〔白鯨記〕(*Moby Dick*) 等相比，〔安娜·卡列尼娜〕或許更容易讓我們產生歸屬感。托爾斯泰所關心的問題無疑是當時俄國最迫切的一些問題。唯有當我們了解他寫作的傳統和所生活的環境之後，我們才能够了解他當時的反應。

沒有單獨的一個作家——即使是最偉大的作家——能够代表他那個時代所有的經驗。然而托爾斯泰的一生卻難能可貴的表達了俄國在日漸上升的危機中的企望和困惑。莫斯科版的九十本書，記錄了當時俄國人面對深刻而難解的問題時所產生的感覺，成為那個時代的證言。透過托爾斯泰的一生，我們可以將焦點擺在那個時代的人身上，由於後來的一些事情，這些人引起了全世界人的興趣。

托爾斯泰是尼可萊·托爾斯泰伯爵的四子，同時也是最小的兒子。他生於一八二八年，卒於一九一〇年。就政治上的意義而言（要了解俄國文學，政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這意味了當托爾斯泰成長之際，正有一股新的力量開始改變他同胞的自我意識。白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死後的第二年，托爾斯泰剛好滿二十歲。白林斯基是當時評論家的祭酒，同時也是一個熱忱的民主主義者。對白林斯基而言，一八四〇年代正是這個新起的力量——新興的俄國知識階級——最活躍的時代。在後來的十年中，白林斯基的後學者，擔起了傳播觀念的責任（在這個國家裏，不同的政治立場只能藉著開放或含蓄的觀念來表達）。這些後進比白林斯基更有理想、更熱心、更激進，但對於立場不同的人也更不寬容。他們最後掌握了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雜誌——〔當代〕(*Contemporary*)。托爾斯泰最早的作品就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一八四〇年代親斯拉夫主義者和親西方主義者之間最大的爭執便是國家命運的問題。托爾斯泰亦捲入這個爭論

的怒潮中達數年之久。這些作品反映在他一八六〇年代和一八七〇年代兩本主要的著作中——「戰爭與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尼娜」。

當時知識界最有力的領導人是功利學派的人民主義(populist)思想家。這些人多半是親西方派，致力於民主理想的發展和科學進步，但是他們和西方陣營的老前輩——啟蒙的貴族分子之間亦常有齟齬。唯一能够取代白林斯基領導當時年輕思想家的車爾尼雪夫斯基(N. G. Chernyshevsky)和托爾斯泰同年出生。他和比他年輕的夥伴杜布洛留布夫(N. A. Dobrolyubov)均出身平民，同為牧師之子，也都曾是神學院的學生。他們屬於當時所謂的「屬於各種不同階層的人」，包括牧師、商人和小官員的子女，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中堅分子。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後，擁有土地的貴族不得不讓出一席之地給由企業家和財政官所組成的新階級。

托爾斯泰出身於一個有名望的大家庭，年輕時，他便深深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的階級。因此，我們當然不能期望他能欣然接受當時社會上的一些改變。這個新的知識階層，對托爾斯泰而言是相當陌生的。如同彭亞洛夫斯基(Pomyalovsky)於一八六〇年出版的小說「平民之樂」(*Plebeian Happiness*)裏的主人翁莫洛托夫一般，這個新的階層和土地沒有絲毫牽連。莫洛托夫的童年，從未受到祖業的庇蔭。然而這種經驗對托爾斯泰而言卻是意義深長的。沒有這種經驗的牽絆，使得莫洛托夫享有一種特殊的自由。他的出身寒微，不像商人之子、神學院學生或沒落的貴族，他沒有難以擺脫的傳統包袱。這使他成為「新人」中最幸運的，帶着最健全的印信進入知識分子的國度。

托爾斯泰生而擁有這祖業，他從母親那兒繼承了座落在俄國中部的亞斯那亞·波里耶那(Yasnaya Polyana)莊園。

在那兒他度過了大半的童年，母親死後則由兩個姑姑監護長大。終其一生（尤其是一八五〇年代晚期他在那兒定居後），亞斯那亞·波里耶那成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親密的關係和他最後拋棄莊園，一個人死在西伯利亞大草原區一個火車站上的事件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對托爾斯泰而言，亞斯納亞·波里耶那莊園所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方式，有時是他的支柱，有時是他的避難所，有時是古代虔誠信仰的焦點，同時也是開向俄國的一扇窗。〔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可以說是托爾斯泰的代言人）求婚被拒後感到挫折沮喪，但是當他站在自己土地上的那一霎間，又恢復了對自己的信心。對列文而言，這「古老的大房子」就是他的「整個世界」。他的父母在這個世界裏生長死亡，在列文眼裏，他們的一生是完美而理想的。列文也希望帶着自己的妻子和家人過著同樣完美的生活（〔安娜·卡列尼娜〕第1部第27章）。

早在一八五八年，托爾斯泰就曾在「鄉間的夏日」一文中坦白承認：「如果沒有亞斯那亞·波里耶那，我將無法想像俄國以及我對她的態度，我可能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俄國所需要的一般法則是什麼；然而沒有亞斯那亞·波里耶那我也就無法如此熱愛我的祖國。」和其他的人一樣，當時托爾斯泰也正思索者農奴解放後，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熱愛自己所生活的角落的小地主」將會產生何種影響。所幸一八六一年解放發生後，托爾斯泰並未被迫放棄亞斯那亞·波里耶那。一八五〇年代末期，他在那兒建立了一所鄉村學校，自己教學，並發行了一份雜誌，記錄他的實驗並傳播他的觀念。雜誌的名字就叫〔亞斯那亞·波里耶那〕（*Yasnaya Polyana*）。托爾斯泰對亞斯那亞·波里耶那的依戀由此可見。

擁有這所莊園，使得托爾斯泰能夠只爲自己寫作。除了有時沒錢，通常他總能自行出版自己的作品，不必仰賴編輯或發行人。這和普希金（Pushkin Alexander）需要仰賴沙皇的恩惠和財物支持有顯然的不同。但是托爾斯泰並非當時唯一享有這種「特權」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在該區中部擁有更大的資產。只不過屠格涅夫的後半生，以旅居國外爲滿足，這個地方對他而言不過是歲收的來源，他只偶而在夏天裏回來看一看。倒是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共同的朋友阿方納西·費特（Afanasy Fet）和托爾斯泰比較相似，但是費特經營土地的機警和執拗卻遠非托爾斯泰所及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和他的夥伴截然不同，對於與土地無關的活動，他絲毫不感興趣。對他而言，沒有田地房產可以管理的生活，將是毫無意義的。

在人類生存的基礎上，托爾斯泰和列文抱着共同的信仰，他不喜歡西方和俄國漸趨工業化的都市文明，他珍惜傳統簡樸的鄉村生活。雖然他知道不公平的農奴制度破壞了田園逸趣，他也由衷的歡迎農奴制度的結束，但是在他看來，家族層級統治方式在道德上是正確的，同時這種方式也比較能夠滿足他情感上的需要。

托爾斯泰的基本思想是繼續維持農業經濟。但是他的想法和其他贊成農業經濟的作家又有不同之處。我們可以自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家中舉出兩個例子——華滋華斯（Wordsworth William）和哈代（Thomas Hardy）。華滋華斯和哈代都是自己刻意製造的世界的旁觀者，他們所擁有的土地純粹是想像的。除了創作外，他們可以說是沒有其他更重要的職業了，雖然一個曾經做過建築師，另一個曾經做過掛名的牧師。而嚴格的說來，托爾斯泰，當時最有名的作家，從來不曾成爲一個真正的職業作家。

亞斯那亞·波里耶那的傳統、例行公事和安全感給了托爾斯泰穩固的立足點。在軍隊中，他是一個道地的士兵，在田野中他也有農夫的第一手知識。雖然人民主義批評家米克哈伊洛夫斯基（N. K. Mikhaylovsky）曾抱怨托爾斯泰時而忽略時而歪曲農人的態度，過度誇張了他們的天真和迷信的傾向；但是我們仍然認為列寧（V. I. Lenin）對高爾基（Maxim Gorky）所說的話相當有道理：「在此之前，俄國文學中沒有真正的農夫。」

托爾斯泰的教育多半來自自修，雖然他也曾在大學裏待了幾年（一八四四——四七），先就讀東方語文學系，又由東方語言系轉至法律系，沒有修完學分就離開了。這幾年的學校生活無法令他滿意。和在柏林攻讀黑格爾（G. W. F. Hegel）的屠格涅夫比起來，他簡直就是「化外之民」，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原始人」了。他手不釋卷，從不懈怠，但也沒有什麼一定的次序。這種閱讀方式可以滿足他每一個時刻的需要。他富有懷疑性的思考力，喜歡由沒有根據的事物中找出答案。他以能夠有自己的發現，能夠重新組織亞丹斯密（Adam Smith）以前之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主張唯有勞動力才是真正的生產力）的學說而自豪。每當托爾斯泰開始講大道理時，屠格涅夫就會很不耐煩，這也的確有他的道理。

在思考方面，托爾斯泰的表現時好時壞，但不管怎麼說，他的思想都是不容忽視的。他常常能夠適切的看出同時代人的不實際和膚淺，並表明自己輕蔑的態度。當時取代白林斯基的急進主義者，由黑格爾的學說轉而崇尚邊沁（Jeremy Bentham）、穆勒（J. S. Mill）、史賓塞（Spencer）和孔德（August Comte）的學說。這也就是說，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年輕時所面臨的觀念上的問題，隨即成為車

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布洛留布夫思想的外貌。但是托爾斯泰的思想卻決定於上一個世紀的思想。他的成長模式和凱瑟琳女王時代的貴族成長模式較為接近。喜好批評，雖非專家，但是對自己富於智慧的判斷充滿了自信，充分顯示了啟蒙時代的精神。他富有還原精力的心智近似於伏爾泰（Voltaire），他對神秘事件的不耐煩也和伏爾泰如出一轍。盧梭（J. Rousseau）動人的情操和清晰易懂的說明方式無疑也是托爾斯泰本人的方式。像大多數十八世紀主要的思想家一樣，他堅決的相信世界在它自己的體系中是十分穩固的，而且有既定的道德基礎，他執意的相信人類是絕對自由的，他強烈地排斥可能將他的時代以及他更能處之泰然的時代分開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他也並不同意一般人希望俄國經由政治革命達到千年至福的想法。他所關心的是個人潔淨的良心，追求的是個人的正直、正確感覺的恢復，和廉潔的判斷，而非一般的幸福。有時，托爾斯泰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傳統主義者。

雖然托爾斯泰和柏克（Edmund Burke）一樣以「背負起祖先的印記」為榮，同時也珍愛能與自然融和的偏見，但是他和柏克一類的傳統主義者仍有不同之處。他的心智大約和講求實際的史威夫特（Swift）較為接近。他由哀悼無法追回的過去轉為嚴厲的批評現在。對托爾斯泰而言，他的信仰只有在對抗他磅礴的批評力時，方顯出它的意義。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樣，托爾斯泰心中有一股強烈的毀滅力量，他的思想可以說是對現代社會發展過程的一種抗議。他對事物的感覺是反動的，這也是他堅信不疑的基石，沒有任何邏輯可以動搖，但是他並不像尼采這樣的不瞻前顧後。

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後，俄國境內面臨着重大的經濟劇變，此後數年正是托爾斯泰創作力最豐盛的時代。一九〇八

年，他度過八十歲的生日，比他同時的偉大作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 (Ivan Goncharov) 和杜思妥也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等多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他仍孤獨的站立着，成為過往歲月的遺跡。他甚至得以成為契訶夫 (Anton Chékov) 的朋友，並懷着不安的好奇心看着日後傳播「社會寫實主義」的高爾基的成長。在他的小說和後來為眾人所寫的宣傳冊子和寓言故事中，托爾斯泰費心的完成了一套學說。但是這套學說卻無法被大多數的人全盤接受（雖然也有人認為甘地 (Mahatma Gandhi) 承襲了他的衣鉢），不過托爾斯泰也因此獲得了相當的道德權威。他的存在似乎就是在斥責瀕臨巨變的俄國社會中的種種貪婪和不公平。

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垂死時曾懇求托爾斯泰放棄傳教士這個新的角色而重返文學。但是托爾斯泰卻宣稱「戰爭與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尼娜」引起他道德上的厭惡，對這兩本書他都加以排斥。實際上，在最後的三十年中，他掙扎着擺脫以往的一切，毫無吝惜之心，並一心模仿一般單純的人的虔敬和順從。這是一個強弱懸殊的比賽，終其一身托爾斯泰仍是托爾斯泰，雖然總是受着某種桎梏。

不論屠格涅夫多麼的擔憂，托爾斯泰畢竟還是一個作家。能够最正確及巧妙的描繪出他自己的立場的，無疑是扮演小說家的那位托爾斯泰。他的作品顯示了多層次的意識，如同詩人一般，小說家所要處理的不是觀念本身，而是引起這些觀念的經驗。托爾斯泰以直接陳述的方式來表達他的觀念時，通常會受到比較大的限制。一本與作者的經驗息息相關的小說，所要表達的並不是一種論證，相反的，它的目的在於記錄每一種情況的感覺和其交錯複雜的關係。這是批評家在批評托爾斯泰的作品時所不可忽略的。